

# 论有利被追诉人原则

罗 曲

(中南大学 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要:**有利被追诉人原则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其强调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蕴含着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司法宽容以及对国家权力机关的司法克制。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概念虽已被提出,但其理论体系仍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还没有确立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其确立与实施应当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强制措施制度、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以及践行“罪疑从无”原则。

**关键词:**有利被追诉人;人权保障;无罪推定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65-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12

## On the Principle of Favorable to the Accused

LUO Qu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410012)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favorable to the accused is the embodiment of respecting and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It emphasizes protection of the criminal accused rights, and it contains the judicial tolerance to the accused and the judicial restraint to the organ of state power. Although the principle has been put forwar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and the principle of favorable to the accused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 of this principle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compulsory measures,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non-prosecution,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advocacy,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no punishment in doubtful cases.

**Key words:** favorable to the accuse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的两大基本价值。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垄断刑罚权,主动运用国家权力实现对犯罪的追诉与审判,以维护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作为被追诉对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防御力量的弱小与地位的尴尬,往往与国家专门机关之间不能形成平等的刑事对抗法律关系,因而其权利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这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基本问题是在惩罚犯罪基础上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而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确立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意义所在。

早在古罗马时期,“存疑时有利被告人”(in dubio pro reo)作为刑事诉讼格言在实践中得到贯彻。罗马法之《学说汇纂》出现了关于无罪推定的措词,

出现了“保护人”制度这一最早的辩护制度的雏形。可见,当时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率先提出“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审判公开”等口号,显示了近现代人权保障的开端;现代法治的控辩对等、正当程序等观念则是人权保障理念被落实的表现;英美法系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亦是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的体现,至今仍散发着其迷人的魅力。中国古代文献《尚书·大禹谟》中也出现了“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有利于被告人思想理念的记载。此后,在长期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作为被追诉、被惩罚的对

收稿日期:2017-01-16

作者简介:罗曲(1992—),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研究。

象,被当作刑事诉讼的客体,其权利更是被忽视甚至被践踏。但是,有关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理念因其所含的价值一直被关注、被重视,其相关理念亦被制度化。其中,“罪疑惟轻”思想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继承与发展就是一种体现。几千年前的简单话语到现在动态、多维、开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体系,证明了刑事诉讼法是一个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断重视与加强的过程,也证明了确立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价值。

### 一、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内涵

纵观国内外研究理论,人们对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往往各自选取着力点进行研究,从散乱的法律法规中进行单独分析,或强调权利保障却无制度建构保障的论说,没有系统地对被追诉人权益保护的原则、制度、措施进行深刻的理论提升,而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一项纲领性的、具有广度和深度、可以统领已经生成或未来不断出现的对被追诉人权益保护的理论和制度的原则,实现人权保障之价值。

有利被追诉人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界定主体概念,“被追诉人”是指“被指控犯罪并受刑事追究的人,适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sup>[1]</sup>。其次,它不是仅从被追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为被追诉人开脱罪责的原则,而是一项刑事诉讼领域的强调保障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多维、动态、开放性体系的纲领性基本原则。最后,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一系列程序和制度中所蕴含或体现的刑事诉讼谦抑理念和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尊重与宽容。

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具体要求可概括为:第一,在纠纷解决开始时要保持克制。刑事诉讼的启动往往会对被追诉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公民一旦被卷入刑事诉讼中,其自由、生活、工作等都会受到限制和影响。所以追惩犯罪开始时,尽量不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如适用刑事不起诉制度;或者尽量不使用强制措施或适用轻缓的强制措施。第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要践行妥协和保障公正。妥协的实质是理解与合作,公正则是程序诉求的应有之义与诉

讼结果的权威性根源。所以追惩犯罪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纠纷,如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保障双方平等参与诉讼,确保程序公正。第三,在纠纷解决结果上要追求宽容。宽容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追惩犯罪中的宽容侧重对刑事被追诉人的宽容。所以法官发现事实存疑的时候,要践行罪疑惟轻的要求,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限制对被追诉人就同一事实的再次追诉,践行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

## 二、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理论基础

### (一)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护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建构的内在要求。宪法是人权的大宪章,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探照仪,保障人权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其实施情况体现了一个国家具体实现人权保障的水平。在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已被写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不得不说是我国人权保障意识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国家管理与司法活动中,刑事诉讼与人权关系最为密切。一方面,有因刑法涉及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健康权等的考量;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又有最大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国家追究犯罪、实现刑罚权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实现刑罚权的工具,国家权力运用的主动又非常普遍,国家机关有时会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利被追诉人原则作为关注、强调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其重视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基本权利实现,从而实现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目的。

### (二)权力制约理论

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乃是国家凭借其所能控制和支配的公共资源和价值,单方面地确认和改变社会关系,控制和支配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或人身的能量和能力。<sup>[2]</sup>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的行使往往交由相关机关行使,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刑事裁判便是国家权力——司法权的行使表现。权力乃是游走在棋盘上的棋子,既可是正

义、守护的一方,成为保障公民权利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是非正义、攻击的一方,成为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最大侵害者,因为占据权力位置的人不一定都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或者他人永远不会滥用权力。权力本身具有的专横、扩张倾向,要求对权力进行克制、监督与制约,而且必须用一种与权力相等甚至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

在我国,漠视权利的封建思想些有留存,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宁可错抓,亦不可错放”的顽固思想也有留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左”的思想亦有深刻的影响(如“严打”活动的进行),进而导致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太重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被追诉人成为只是被追究的对象。鉴于刑事诉讼活动中国家权力的扩张本性,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设置缓冲,迫使国家权力内敛化,并要求国家权力的一切行动皆应有助于提升人的价值、扩展人的自由、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谋求人的全面解放。<sup>[3]</sup>

### (三)司法理性论

在司法过程中,国家权力的行使具化为公、检、法等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因此司法理性即是司法工作人员的理性。司法人员作为人,有着人性的弱点是必然的。一方面,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人只能用自己的眼光与角度来认识世界,只能用已有的知识、经验与方法来看待与把握世界,人不可能知道所有一切的事物,有所疑或错误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在法律设定中,司法人员被假定为“理性人”,他们应当能够理性、客观、公正地认识事物、判断是非,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比如,法官审查证据、裁断案件时,可能会不自觉地运用先前经验与方法来对证据和事实进行认知判断,根据先入为主的偏见与当事人的人格情况等来裁断,从而可能会形成对案件的错误判断。此外,法官的法律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经验常识水平、道德情感因素等都可以决定其对一个案子的认知,故司法主体无法做出一个绝对正确的裁决。而有利被追诉人原则要求对裁判者进行司法克制,规避裁判者的恣意与随意,如通过检察官、法官精英化、辩护制度等来对抗司法裁判的非理性。

### (四)诉讼主体理论

诉讼主体性是指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中不是诉讼客体,而是具有诉讼主体地位、享有广泛权利的一方当事人的特性。<sup>[4]</sup>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将刑事被追诉人当做同警察、检察官、法官具有同等诉讼地位的诉讼主体,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公正地对待他。作为诉讼主体,国家追诉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有着同等的地位,这是当今诉讼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两者应是利益对立但地位平等、权利对等的关系。因而,要求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刑事被追诉人与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的机会与能力,确保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具备正当的法律程序。

我国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但仍不足以保证刑事被追诉人实际上享有同国家追诉机关相对抗的防御力量。有利被追诉人原则就是针对国家权力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提出的一种偏向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有力措施,此原则要求承认被追诉人诉讼的主体性,保证被追诉人真正行使辩护职能,保障其确实行使基本诉讼权利等。

## 三、有利被追诉人原则的确立与实施

### (一)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证明责任的分配、法院定罪、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衡等基本内涵,使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中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保障并免受国家权力机关不合理、非正当的追究与定罪。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成为有利被追诉人原则中的基础性、核心性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们通常将这一规定视为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表述,但笔者认为,我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原因有三:第一,在其他国家法律与国际公约中,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表述推定为无罪,而我国却表述为“不得确定有罪”,这种否定式表述暗含了一种倾向于有罪推定的暧昧态度。第二,无罪推定原则不是一项孤立的诉讼原则,必须发挥相关配套制度的作用,而我国没有确立其核心配套保障制度一沉默权制度。尽管沉默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犯罪事

实查明的进度,但人权保障价值、去除“口供为王”的传统思想以及对刑讯逼供的阻碍等价值决定其“利大于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虽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第118条又规定“如实回答”的如实供述义务,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与模糊性,加上司法侦查人员对“如实回答”的主观判断的随意性,使得逼供、诱供现象层出不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控方举证责任的推卸。第三,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判决类型的规定:“……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其中,区分“确信无罪判决”和“疑案无罪判决”<sup>[5]</sup>,使被告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判决回归社会后,仍会有社会的怀疑目光,要体验一种持续的被怀疑痛苦。

因此,我国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做出无罪推定的明确性表述。例如,“未经人民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应当推定为无罪”,落实无罪推定理念在司法工作人员中的肯定性确立。第二,确立“沉默权制度”。取消“如实回答”义务并明确规定沉默权,完善权利告知程序并逐步赋予刑事被追诉人律师在场权。另外,针对沉默权之弊端,逐步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第三,完善相关配套与辅助机制。在当前区分“确信无罪判决”和“疑案无罪判决”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不合理评价疑罪从无,可以逐步建立对这部分人的案卷记录封存制度。

## (二)完善强制措施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刑事司法程序中直接关乎刑事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措施,其适用好坏影响这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程度。新刑诉法虽丰富了取保候审制度、细化了逮捕羁押制度等,但仍有不足:第一,各种强制措施的启动标准仍不够明确,强制措施的适用主体宽泛。第二,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逮捕率仍居高不下。第三,羁押期限漫长,犯罪嫌疑人从被拘留到被批准逮捕的期限最长达37日,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最长达7个月,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一般需要接受8个月左右的煎熬才能等到审判,犯罪嫌疑人被暂时释放等待审判的权利保障不足<sup>[6]</sup>。第四,羁押必要性和合法性审查存在不足。新刑诉法第一次明确赋予检察

机关对于被逮捕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职能,确立了“检察审查”程序,但立法上存在粗疏,笼统性规定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必须进一步更新强制措施适用理念,完善现行强制措施制度。第一,坚持程序法定原则,秉持必要性使用之目的,合理、合法启动,依法、合理计算强制措施适用期限,建立对侵害刑事被追诉人权利行为的监督制衡机制,预防强制措施的随意适用与国家权力的恣意。第二,完善逮捕审查制度,明确侦查机关的证明责任,完善逮捕的证明程序,在可能性情况下尽量用其他强制措施代替逮捕措施。第三,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完善审查程序,确立不同阶段的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以及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如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可以参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同时参考刑事被追诉人在押期间的表现,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及诉讼进展情况等,综合考量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

## (三)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刑事不起诉类型:法定不起诉(绝对不起诉);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刑事不起诉制度秉持了纠纷解决开始时保持克制的理念,对简化诉讼程序、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明显好处。同时,有利于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也是其值得推崇的原因所在。通过对不应追究、不需要追究、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子及时做出不起诉决定,可以防止久侦不决、久押不放的做法,及早地使刑事被追诉人脱离刑事诉讼程序,免受诉累。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不起诉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刑事不起诉率低,检察机关的刑事不起诉裁量权受到限制。如此,原因之一是倾向于起诉权的公诉权认知与追求起诉率的态势;原因之二是不起诉程序特别是酌定不起诉程序烦琐,使得适用的可能性降低;原因之三是刑事不起诉引起的个别当事人的不满与抗议,引发涉检涉法上访等,降低了公诉人适用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积极性。

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第一,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酌定不起诉的范围的限制相当严格,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定性,可以

将“犯罪”理解为轻罪和重罪,只要情节轻微均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此外,还可以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等因素。第二,认真推行当事人和解程序,依法行使酌定不起诉权。第三,建立不起诉听证制度,完善不起诉听证程序。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存在着透明度不高、缺乏民主性等缺点,易暗箱操作以及引发当事人的不满与社会公众质疑等,而建立不起诉听证制度,可以提升其权威性与执行力。

#### (四)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

辩护权是刑事被追诉人最重要的基本诉讼权利,其行使是实现辩护职能与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完善刑事辩护制度,有利于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实现控辩平衡、实现司法公正、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从而防止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侵害。实际上,刑事辩护权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比如存在庭审空间布局的不合理。中国刑庭庭审时,刑事被追诉人往往单独被置于庭审中间,与审判员形成“对峙”,而其辩护人与控方置于两方,导致刑事被追诉人与律师不能进行沟通交流并实现有效辩护。因此,需要调整庭审空间布局,针对被追诉人的“特殊位置”,借鉴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模式下的庭审布局,让被追诉人与其辩护人置于一处,与控诉方形成“对峙”,并确保行使控诉、辩护、审判职能的三方成为三角模式,从而实现公正。

我国新刑诉法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并与刑事自诉案件和解程序共同构成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降低刑事被害人上访告状概率;另一方面则是丰富了刑事法律中的从宽处理的情节,如适用较宽松强制程序、强化酌定不起诉理由、量刑时予以从宽处罚。这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践行妥协的实践,这给予了刑事被追诉人一个改过向善的机会,也可以使刑事被追诉人减少参与诉讼程序或提前终结诉讼程序,亦利于实现被追诉人顺利回归社会。因此,要推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施行,如扩大公诉案件和解程序适用范围。刑法规定,犯罪主体特殊的案件可以予以从宽处理和从宽处罚,因此将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扩宽至犯罪主体特殊案件,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满七十五周岁老人、残疾人犯罪案件等。此外,对于刑事和解,必须消除对其的误解并转变刑事司法观念,积极吸收律师参与

刑事和解,促进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参与和解;公安机关主动给刑事被害人释理释法。

#### (五)践行“罪疑从无”原则

“罪疑从无”原则,又称“存疑时有利被告”原则,指当案件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被告人的认定。它不同于无罪推定原则,比如适用条件与范围就不同,罪疑惟轻原则是一项仅适用于审判阶段的事实裁判规则,是在按证据规则评估证据后才能运用的规则。其适用范围包括:1. 当存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疑问时,若不能完全证实达到犯罪构成要件就应当做出无罪判决,这是定罪上的有利被告人,即“疑罪从无”;2. 当事实存在重罪与轻罪之间的疑问时,应当认定为轻罪;3. 当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情节,这是量刑上的有利被告人,即“疑罪从轻”;4. 当追诉时效是否完成存在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认定,即免诉判决。

“罪疑惟轻”原则蕴含的精神与罪刑法定、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等价值理念相契合,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的追求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相平衡的宗旨,不能牺牲对人权的保障去片面追求惩罚犯罪,否则会导致冤假错案。犯罪本身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若在罪疑的情况下科处刑罚,一旦冤枉了无辜者,就会产生新的受害人,形成对社会秩序的第二次破坏,这同时也是对真正罪犯的放纵。此外,若允许司法机关在罪疑的情况下将人入罪,会出现司法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如果做不到不放过一个坏人,那么起码得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我国现行刑诉法基本确立了“罪疑惟轻”原则,但由于司法观念尚没有更新与转变,加上配套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司法实践中仍有“疑罪从有”的现象或者看似“罪疑惟轻”但实为“罪疑惟重”的做法。比如,死刑疑案中因证据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无法判处立即执行死刑却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找到真正罪犯或被害人“死而复活”后再宣告刑事被追诉人无罪的做法,看似是避免了对生命的剥夺,实际上却剥夺了人身自由。因此,必须加强司法工作人员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加强社会舆论“罪疑惟轻”的认同工作,落实相关配套制度,真正践行“罪疑惟轻”原则。

(下转第85页)

- 溪文征:第13卷.
- [8]沈德符.野获编:第13卷[M]//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69,下.
- [9]范锴,刘正武.浔溪纪事诗 续浔溪纪事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10]沈登瀛.沈柳堂文集 南林乡前辈私祀录序[Z]//民国乌程张氏刻本.张钧衡.适园丛书.1916(民国五年).
- [11]董斯张.吴兴艺文补:赵征君传[M]//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3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2]沈登瀛.沈柳堂文集 精庐小集图跋[Z]//民国乌程张氏刻本.张钧衡.适园丛书.1916(民国五年).
- [1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
- [14]徐珂.天苏阁丛刊 可言[M]//影印本.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133,上.
- [15]刘勰.文心雕龙注:第4卷[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6.
- [16]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J].史学月刊,2009(12):65-69.
- [17]汪曰桢.玉鉴堂诗集:第5卷 题精庐小集图六十四韵[M]//影印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5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8]丁桂.精庐雅集图记[Z]//民国刻本.周庆云.浔溪文征:第10卷:9b.
- [19]刘锦藻.刘序[Z]//民国刻本.周庆云.浔溪诗征.
- [20]徐世昌.清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1]汪曰桢.二十四史月日考[M].稿本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22]孙燮.南浔三先生传[Z]//清道光刻本.愈愚续集.
- [23]孙燮.纪半虔哀辞并序[Z]//清道光刻本.愈愚后集:第3卷:24a.
- [24]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民间信仰与奢侈风尚[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09-118.
- [25]郑振满,郑志章.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力与地方社会[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1):4-13.

(上接第69页)

#### [参考文献]

- [1]邓思清.刑事被追诉人的地位、权利与保障[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 [2]苏惠渔,孙万怀.论国家刑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李旭.论有利被追诉人原则[D].长沙:中南大学,2009.
- [4]童建明.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 [5]林喜芬.中国确立了何种无罪推定原则:基于2012年刑法修订的解读[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1):130-136.
- [6]陈莹莹.新刑法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兼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比较[J].西部法学评论,2013(4):15-22.